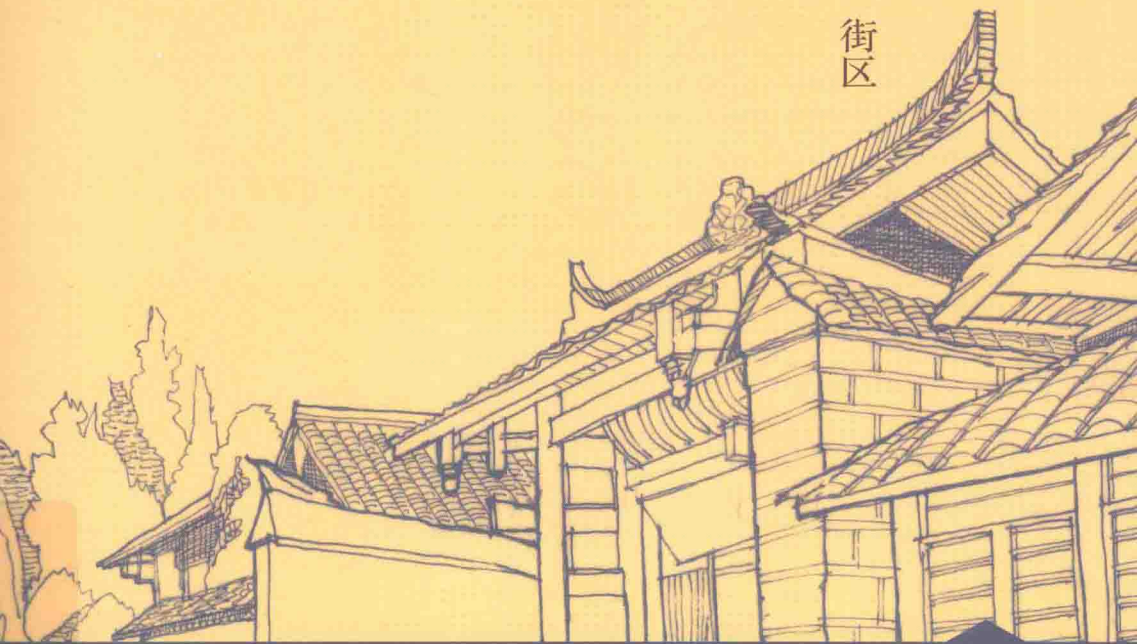


中华遗产·人居典范 | 书系

巴蜀场镇

地理
景观
街区



刘森林
著

巴蜀场镇

——地理 景观 街区

刘森林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场镇：地理景观街区/刘燕萍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7191-5

I. ①巴… II. ①刘… III. ①乡镇—概况—四川省 IV. ①K92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2090号

责任编辑：周莉桦 赵益鹏

装帧设计：瞿中华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何 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北京亿浓世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0mm×220mm 印 张：16.5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插 页：24 字 数：209千字

印 数：1~2000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产品编号：054131-01

《中华遗产·人居典范》书系 / 序

中国各区域遗存的历史人居环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技术、价值观、社会文化习俗和不同文化圈或文化类型的表征形式之一。它以其丰富的信息和独特性而成为历史的见证，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然而，世俗往往以相悖的现实情境或价值态度诉之于视听：一方面，众人的保护意识有所强化和提高；另一方面，漠视、破坏的现象和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反观近世欧美诸国对之延续、维护、更新、改造的认识和行动，大多趋于守常、葆真、如旧、如初，其间不乏高端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将其纳入具有约束性的条款乃至法律的范域中，鲜见脱胎换骨式的冒进举措或新潮性的形式表述。其旨、其为或如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向大家发出的一段忠告里所阐述的那样：“城市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分岔路口……，如果对历史有了深刻的了解，对那些至今依然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有了高度的自知，我们就有

能力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这一抉择无论如何终将改造人类，即是说，人类或者全力以赴发展自己最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支配，最后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意欲认识城市的渊源、前生、变迁、结构和功能，必然要对历史的遗存倍加珍惜，期冀“对那些至今依然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能有“高度的自知”，从而提升“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的能力，当然也是历史发展颇为理想的结果。无独有偶，历史学家傅衣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对于如此重要的“石头”，能不慎乎？敬乎？显然，包括建筑遗产、人居环境遗产在内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认识自身历史的最好见证。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事实上，传统与当下并非对立或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即便从“致用”层面看，有关人居环境方面的微观历史、形态研究与当今人居环境的保护、再生和建设活动的内里，无疑涵泳着显明的逻辑或本体性进深的递进和关联性。有鉴于此，我以为，目下切实要做的，当应建构起敬畏之心、虔诚之意，或如钱穆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所说的那般，对待历史要充满温情和敬意——这可能也是保护、修葺、更新和发展包括中国传统优秀物质遗产、历史人居环境场所，乃至城市科学发展在内的一项长期而正确的抉择途径和一种态度，或许，也是学习、实践的辩证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之一，是从事文物建筑、传统村镇和城市历史街区维护、改造、更新、再生暨设计、规划、施工和管理者们的当务之急。

身处快速变革的转型和激荡莫测的思潮变幻中，书生的作用是微渺的。不过，这些纸上烟云确也初步实现了依照笔者擅长的方式呼唤的初衷，进而奉献着共同推动人居环境自身历史发展和逻辑演进的绵薄之力。因而，以传统城乡聚落街区构成、历史变迁和特征等的梳理、复原和阐释的工作性质，大体上规定了《中华遗产·人居典范》书系诸文本的体例和格调——这种致力于对历史场景的读解工作，基本剔除了当下海内盛行的文化经营、工程创意类的运动型情结、权重性效应和群体性介入的取向，并借此作为勾连舆情、获取经济利益抑或政治绩效的契机——这些经营和创意貌似契合了政府有关推进城镇化进程、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经略和潮流，土地集约、人口集聚和经济结构方式的转型、调整和统筹的举措，以及试图减降城乡两元对立格局的现在进行时国情之需，正在快速地打造格式化、过度化的新型城镇和乡村。只是，历来浊清并置、多元共存的世俗情境，亦使得如此鼎革的前提裹挟和增添了隐显不一地删去人居环境中地域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无限可能——历史肌理及其记忆的漫漶或消弭，将随着岁月的更替而显得愈加沉重或迷茫。

基于上述，本书系的撰写实际上也反映了笔者学术研究领域方向的微调——从类别易为区域，变专一为综合，舍宏观而切近微观。如果说这是对先前有关传统人居环境系列研习的一种反动，毋宁认为前后的种种呈现了对中国传统人居环境科学的基础、内容等相关缺失的一种关切、自觉和努力——对于年均 600 余课时，兼顾本、硕、博三级教学和科研任务烦冗的教师而言，似乎只能以聚沙成塔的片断型方式积累和展开。

因此，书系选题及其内容亦呈现着以下特点。一、书的内容即对象的考察和相关积累大多在十年以上，甚至迈越二十年以上；书系所述所论以所见实物、实体为准，文献、史实考证为辅。二、聚焦的区域空间、范围和时段宏微远近各异：大者跨省越市，小者集合于相同地理景观和文化特质的地域中，通常以相同或近似的文化类型为界；纵向时间轴的下限框定在 20 世纪 40 年代——这是一个传统体制、文化意识、核心价值观终结的时代。少数根据实际状态顺延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三、选题和对象的差异决定了方法和切点的不同：有些偏重于气候、地理条件、资源和经济方式等关联度较高的方面，有些着力于区域的核心、外围和辐射区的辨析，致力于传播、交流和互动的层面分析变迁、播化和变量的过程、结果以及特征形成的比较，但主旨仍在于探讨城乡聚落街区的构成、变迁、人居环境文化和建筑风格等，各在在不在不同。四、“河出图，洛出书”。图文并茂有助于扩大对书籍阅读的理解和比较过程中视觉的独特功效。一方面，图像在“传既往之踪”层面比文字直观、有效；另一方面，图像相对的原真性一可凸显以图证史的功能和价值，二可提升可读性。书系的图像由现状彩图、正投影建筑制图、透视图和地图等四部分组成，试图构建起一种现势、真切的观看和阅读方式。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指出，欲领略世之非常之观，当须具备四项：一曰志，二曰力，三曰不怠，四曰相。四项中的一、二、三项主要关乎和取决于自身，尽管“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但努力则是前提和必需的——唯有竭尽全力，若仍不能至，也只能“可以无悔矣”。文中的“相”，当是辅助之意。在漫长的调查和撰

著过程中，笔者得到了众人的关爱和援手，他们的帮助使得本书系不至于出现过多的谬误或纰漏。然此四项，又“非人人能得，故事亦不可件件皆成”。在此，真诚地希望能得到读者和方家的不吝教正。顺此，也希望《中华遗产·人居典范》书系并非仅是无所事事的自娱，自言自语的空寂，抑或无知无畏的偏拗。因为，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笃信，多样性的区域人居环境及其蕴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始终将会是人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深远主题，是为序。

刘森林

2013年6月23日于康奈尔大学

前言

在长江流域广袤的空间和绵邈的建筑、景观的历史嬗递中，巴蜀场镇的发轫、勃兴及其形态和面貌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浓郁的地域性和一定的典型性。洵如吴良镛院士所说：“巴蜀地区，山川荟萃，场镇、建筑经历代先民之经营，形成独具特色之文化”。多年来，余虽数次入川调查，仍不免存挂一漏万之嫌。在此，要特别感谢以下人员在资料收集方面付出的劳动，他们是解放日报社薛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室内陈设和工程管理高级研修班学员钟瑞嘉，江南建筑设计研究院徐峰。另外，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设计系教师刘清清、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2012 级硕士生陈佳维和 2012 级博士候选人李刚提供部分照片，2010 级硕士生王嫣制作地图，在此一并致谢。

刘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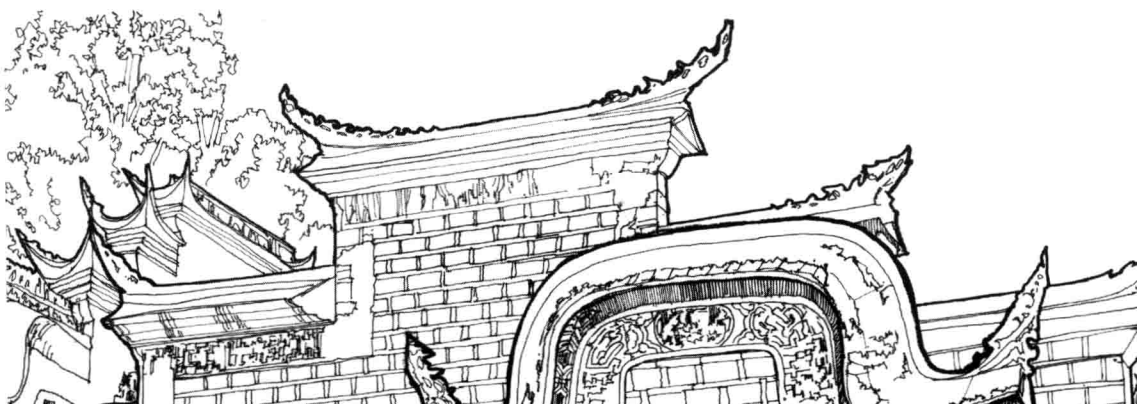
2014 年 4 月

目录

《中华遗产·人居典范》书系 / 序	I
前言	VII
第一章 概论	001
一、概念和范围	003
二、变迁和类别	018
第二章 环境、经济和社会	031
一、自然环境、气候和交通	033
二、经济和文化	047
三、移民和社会	063
第三章 空间、构成和格局	077
一、类型和结构	078
二、构成	108
三、街巷	118

第四章 建筑类型、形制和特征	125
一、民居建筑	126
二、宗祠建筑	147
三、会馆建筑	148
四、宗教建筑	155
五、商业建筑	165
第五章 建筑装饰和室内陈设	171
一、结构和装饰	172
二、装修和陈设	186
三、家具	194
第六章 人文地理和景观	207
一、市集和街区	208
二、舟船、桥梁和码头	223
三、其他	233

概论 / 第一章



早期的巴和蜀，既是地名、族名，又是方国名。从历史地理学和民族学方面看，巴、蜀的疆域除了今四川省和重庆市，也曾涵括今陕西宝鸡、陕南、汉中、鄂西、鄂西北、湘西北乃至滇东北、黔北和黔西北一部的广大区域。历史上的巴蜀，无论经济、文化、习俗、风尚和语言，还是人群、交通、建筑或乡村聚落、市场集镇等方面都今非昔比。这种全方位式的变迁和演绎，使得理解、认识古代和近代四川的市场、场镇结构、空间形态、历史脉络和建筑的风格特征等不啻于云遮雾障。基于此，本章旨在对场镇的概念和范围、历史的变迁和类别两方面，进行简明的梳理和解释。

一、概念和范围

1. 概念

旧石器时代丰都烟墩堡和高家镇遗址等的发掘证明，在“巴”这一辽阔区域中很早就产生了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印痕。新石器时代原始种落纷繁，分布广泛，殷商至西周时期约略有清江流域、汉中和渭河之巴等三处。作为虎方遗裔的清江之巴，系为夺取盐池而来^[1]；汉中巴人初为巴方遗裔，曾参与了周武王伐殷讨纣的牧野之战；渭河之巴自黄河中游徙至长江流域后，及至西周中期绝祀。从出土的青铜器形制特征看，宝鸡虢人为巴人的别部，文明程度迈越于清江、汉中二巴之上。作为巴人的源头，其遗民南迁进入大巴山及长江流域后，成为峡江之巴^[2]。简言之，巴，首先指的是生息、繁衍和活动在这一方田土上的人群及其活动的疆域，也就是巴地^[3]；其次，是族群的名称；再次，是这一段历史和文化的专门指称。至于巴国，则通常以建国立都后从古国成为方国起肇始。

[1]

清江巴在今湖北长阳一带，有武落钟离山。他们抵达时已有青铜器，首领廪君，崇虎。参阅《辞海》第六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张正明《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变迁》第二章第三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2]

跨秦岭南北的巴方和强国人为氐羌的东支，氐羌为藏缅语族的先民，而现所公认的巴之遗裔土家族的民族语言恰属该语族。最初由潘光旦于1955年提出，惜从者鲜；后徐中舒改变早年初衷，认为巴人为姬姓周人之别部。请参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载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4辑，1955年。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91-95。张正明《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变迁》第二章第三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3]

峡江之巴由南下巴人即板盾蛮和西上的巴人即廪君蛮共同缔造。此时的巴除川东以外，还涵括汉水中游到长江中游地区；该地早期的部族以及后期的古国、小国也不仅仅限于巴族和巴国。事实上，秦统一和征服的巴国，是其中最主要的巴部族，即以江州（今重庆）为中心的巴国。关于这一点，西向的蜀地、蜀人和蜀族等亦与之大致仿佛。参阅张正明《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变迁》第二章第三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5-6。

历史上巴国疆域、建制的盈缩或更替消长变化明显。据目前考古发现和证实，晚期巴族的活动范围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东部、东北部和江汉平原以西的山地和丘陵区域。此外，汉中盆地一带也有巴族活动范围的部分遗存，且比《华阳国志·巴志》所记载的范围还要大些。迨及立国川东后，其疆域又历经数次变化；从五度迁都的线路和空间即平都（今重庆丰都）、江州（今重庆中心城区）、枳（今重庆涪陵）到垫江（今重庆合川）和阆中（今属四川）看，其格局大致为由东往西、自南而北，辖区主要涵括今鄂西、陕东南、川东、川东南、川南、湘西北、黔北和今四川省的南充、巴中和达州等地。很显然，巴是一个因时、因地、因事（件）而充满变数且蕴含着差异性和综合性的概念。

与巴人历史上长期活动于峡谷山地和丘陵间同中存异的是，裹挟着氏羌族流风余韵的古蜀人经历了从渔猎转捩农耕、从游徙至定居的变异。其疆域一度北及秦、陇南部，南缘今滇、黔以北，即《华阳国志·蜀志》所说的“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1〕}这里的“峨”当指峨眉山；“嵋”，指的是位处蜀地东北、甘肃境内的嵋冢山。不过，蜀人活动的中心范围始终在川西——从早期的川西北岷山到川西平原，概莫如是。无疑，从高原徙至平原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等历代蜀王均以此为活动区间及统治中心，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

李白在《蜀道难》中曾经用“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诗句感叹对蜀史认知的迷惑和渺茫。实际上，蜀国的繁复和演变可能远远超过李氏的“茫然”。今天看来，作为山地民族氏羌的一支，蚕丛氏的活动

范围横跨了岷山和平原；柏灌氏可能是蚕丛氏中往平原迁徙的一个支系，其活动中心已集中至今都江堰一带；而后鱼鳧氏的活动范围也大抵在平原之中。至于杜宇氏系，其族源很可能是由滇东北的一支（或为濮人，西南谓之僰人）和川西氏羌的一支相融而成的。杜宇氏的优长一在于农耕——掌握着较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教民务农”也嘉泽和影响了巴人。二是治水，所谓“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也很有可能是都江堰等水利枢纽工程的前奏，“江、潜、绵、洛为池泽”——数条河流均在此时或稍后获得了开发和利用。杜宇王朝后面的开明氏，系来自东方即长江中游、荆楚大地的支系。他们沿长江溯流西进，进而定居于川西平原。若论其族系，也极有可能是濮人。与杜宇氏相近似的是，开明氏亦擅长治水和农耕，且为最后的蜀王。其子孙后嗣因袭和循蹈开明，也就是古蜀国的开明王朝，时间约与中原的春秋中期和战国晚期大致相当。

一般而言，先秦时期长江流域中的先

[1]

常璩：《华阳国志译注·卷3·蜀志一》[M]，汪启明，赵静，译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80。

民人种以蒙古利亚南亚型为主。从四川巫溪县荆竹坝汉代人骨分析看，他们与后世的樊人悬棺中人头颅改型的风俗一样，其人种或与古越族存有一定的关联^[1]。川西蜀族的主体因源自西北甘、青一带的古氏羌民族系统，故体质上更多地凸显出蒙古利亚北亚型的特征^[2]。原先居留于川西平原的古蜀人则在历史的嬗变中渐次隐匿、沉潜而一路往南，朝向生产生活条件略为低劣、人烟稀少的南部高寒山区进发，或与外来人群相融^[3]。由上大致可知，巴蜀族源不一、人种存异，在先秦及春秋战国时曾多有碰撞和交融。约在公元前100年，巴、蜀相对独立发展的历程基本结束，方国易为地区；及至汉代中前期，栴华风沐夏雨，与新兴的汉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巴、蜀是一个既相对明确而又模糊的概念：相对明确的是，它们各自曾有着大致盈缩的空间区域和差异性；模糊是指两者的类同性、领域边缘的渐变性和历史的层叠性。关于两者的“和”与“异”即类同性和差异性，研究者指出：“盆地东部和西部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在较早时期并不具备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性质。尽管人们通常从地理角度把战国秦汉之际的巴蜀文化视为一个地方或区域文化类型，然而二者在事实上存着显著差异。”^[4]基于此，遂着力于“文化渊源”、“传统”、“面貌”的层面，抑或从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不同学科、角度进行差异化的探究^[5]……可以认为，如若基于上古和中古前期的特征、渊源比较，巴与蜀的差异确实较为明显，然中古中晚期以后逐渐迈向趋同化；两者似乎更应是整体与局部、宏观和微观、共性和差异性等不同关照、不同视域范围内而生成的“区别”。这是因为，相对于秦陇、